



# 在现实生活的密林中创造新的文艺精品

——抗战文学的特征及其当代启示

□杨洪承

◆抗战文学是作家们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形势下开展的文学创造,它既是对生活的记录,也是生活本身,文学与生活真正是“合二为一”。作家笔下的每一个文字,都带着特殊的时代体温,彰显着那一个时代的人们的心声

◆新时代的作家应该像抗战时期的作家那样,深入现实生活的密林,发掘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书写那些默默奋斗的人们,以更加多样的文学形式展现新时代的新气象,创造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文艺精品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始,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进行了14年之久的抗日战争。这是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历史时代。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中国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与此同时,抗战行动激励作家们直面现实的苦难,正视生活的每一角落和各色人生。文学进一步贴近大地和民众,书写生活的残酷和生命的坚韧,由此,抗战文学承载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而丰富的社会容量。这既引领了血与火中的抗战文学不断再生,又建构了宝贵的文学经验,至今仍有深远的历史启迪。

## 民族意志的高扬推动文学观念的调整

面对空前的民族灾难,全国各族人民奋起反抗,为民族解放的神圣抗战贡献力量。作家们的笔墨既记录生活的苦难,也书写人民的觉醒。东北沦陷后,萧军在小说《八月的乡村》中展现了东北人民不甘当亡国奴、誓死保卫家乡、争取民族解放的决心和不屈不挠的斗争。当年鲁迅首肯这“是很好的一部”作品,并推荐“凡有心人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此后,涌现了东北作家群的创作热潮。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中国作家在民族救亡的旗帜下,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艺术派别,从分散走向统一。在炮声中,各种戏剧团超越门户之见,超越地域、流派的区别,纷纷团结起来。接着,作为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组织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该会“发起旨趣”写道,“中国文艺界无疑地尽了广大的责任”,“民族的命运,也将是文艺的命运,使我们的文艺战士能发挥最大的力量,把中华民族文艺伟大的光芒,照彻于全世界,照彻于全人类”。在这一时刻,民族意识的高扬,使作家对于侵略者的仇恨与对于国家命运、人类命运的关注融为一体。

抗战改变了作家的观念,也给文学带来了新的秩序、新的面貌。作家从不同维度参与抗战,自觉地“突进现实生活的密林”。郭沫若说,“我们要牺牲一己之自由求民族之自由,牺牲一己之生命求民族之生命”。茅盾说,“现在多数的文化工作者都抱有‘投笔从军’的壮志”。这正是呼应了“文协”成立大会上向全国文艺工作者发出的号召“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要求作家用笔来发动民众参与到捍卫祖国的抗争之中。胡风发表《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一文,生动地概括了当时的文艺情势,“民族革命战争的炮声把文艺放到了自由而广阔的天地里面”。作家“跑向战火纷飞的战场”,“也跑向落后的城市或古老的乡村”。抗战文学鲜明地表现出作家突破战前多局限于

某城某地的创作格局,开拓了文学表现的空间,促进文学更贴近读者和民众生活。比如,1937年8月,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延安成立,丁玲任团长。随后,西战团组织作家艺术家奔赴前线,以话剧、歌曲、秧歌舞等形式开展宣传。1939年,作家战地访问团从重庆出发,王礼锡、宋之的任正副团长。作家的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他们普遍置身于抗日救亡的工作之中。

文学的定义和功能也发生了变化。过往纯个人的文学观念,让步于整体宣传和服务抗战的任务、目标。夏衍在《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一文中明确指出,“文艺不再是少数人和文化人自赏的东西”。老舍说,“文艺,在这个时候,必为抗战与胜利的呼声”,“当社会需要知识与激励,而文艺力避功利,是怠职,抗战文艺的注重宣传与教育,是为尽职”。在抗战文艺浪潮中,发生诸多有关文学观念的讨论和论争,比如关于“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关于“歌颂与暴露”“普及与提高”的讨论,以及关于衡量文艺作品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讨论,等等。这说明,作家们既突出文学在特殊时期的“尽职”,又不断思考如何尊重文学的审美属性。比如光未然、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与田汉、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前者以古老黄河的怒吼象征着民众惊天动地的呐喊,后者以长城象征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抗战防线。这两部作品,立足中华大地,创造出有意象和旋律,谱写出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曲。文学适应抗战现实的需要,代表了民族意识和民众愿望。在抗战文学中,作家们塑造出新的儿女英雄,使文学浓墨重彩地凸显了深沉而悲壮的民族再生之精魂。显然,抗战文学高扬的英雄、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梦想的重要精神资源。

## 深入战地,创作形态多样的作品

抗战文学从观念到形态都体现了文学在战时的应对和急转,使文学进入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历时14年之久,覆盖中华大地每一个角落,蒙受苦难的民众顽强地奋起抗击日寇。血与火的战斗场景,饥寒交迫的苦难生活,令人触目惊心。作家走进部队和农村,接近战斗中浴血奋战的士兵、忍辱负重抗争的平民。作家观察的视野更远、更广、更深,充满了战争年代的伟大使命感。他们描写贴近民众的日常生活,展现了在新环境中生长起来的新性格,塑造了代表光明前的困境和团结奋进的必要。抗战文学实践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现代化发展的进程,进一步使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任务、目标落到实处,并且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效,尤为今天的文学创作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

态展示了中国抗战波澜壮阔的现实和最完整的历史风貌。

第一,在创作主体上,作家多重身份的同构,使得抗战文学真正融入人民大众生活的实地。抗战初期,作家以笔为枪、以书为剑,深入战区前线,发出救亡图存的呐喊。作家同时也是战斗员、政治工作者、技术员、民众的组织者、教育者、宣传员。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解决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明确地提出文学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本质上正是强调作家与广大群众的一体化或真正融入其中,才可能写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作品。这就从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文艺的大众化、作家要深入到群众中去等方面,指明了作家应该努力的创作方向。

第二,文艺活动多样化,而且保持着动态调适的活力。抗战文学始终循着抗战实践不断发展的情势,表现出多空间的覆盖和鲜明的地域特色。抗战开始后,很多作家积极参与抗战,或进入前沿主战场的各个战区,或活跃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创作样式多种多样。例如,王礼锡的《笔征日记》、白朗的《我们十四个》、姚雪垠的《战地书简》等实录体文学,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第七连》等小说,洪深的话剧《飞将军》,田间的《抗战诗抄》、柯仲平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等。抗战时期文学观念之变,鲜明地体现在:文学和艺术的各种文体界限在消失,什么好用就拿来用,并不断在现实实践中进行融合、贯通。从地域的视角来看,沦陷区、国统区、解放区的不同政治环境,以及各地的不同抗战形势,造就了抗战文学鲜明的地域特色。比如,东北最先出现的流亡文学,上海“孤岛”雅俗兼有的文学生态,延安文学的大众化实践,等等。由此,抗战文学体现了特定时期文学在艺术形态上的百花齐放。今天我们强调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文艺,正是抗战精神的传承和抗战文学实践的历史赓续。

## 积极探索文学的民族形式

战争改变了一切,战争也使得常态的生活、有序的社会文化被打乱了。与此同时,抗战实践使人民大众广泛觉醒。民族意志在抗战旗帜下得以高扬,人民大众进一步认识到现实的困境和团结奋进的必要。抗战文学实践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现代化发展的进程,进一步使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任务、目标落到实处,并且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效,尤为今天的文学创作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

第一,抗战时期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影响广泛,进一步从思想上确立了文艺与广大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创作宗旨。

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随后,文艺界展开了有关民族形式的大讨论。在1939至1940的两年中,参与论争的思想观点多有不同交锋。抗战文艺史家蓝海说:“民族形式的论争是抗战文艺中的一件大事,其目的和文化的民族形式一样,是要将人类的进步的文艺按照我们民族的特点运用。要注重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正是通过关于民族形式的激烈讨论,抗战时期的作家艺术家们“把民族的民间的旧艺术形式中的优良充分吸引到新文艺中来,给新文艺以清新刚健营养,使新文艺更加民族化、大众化,更为坚实与丰富”。它直接影响了延安文艺的发展,更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文学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第二,抗战文学中极具活力的新型文艺不断涌现,从创作实践上摸索出一条彰显“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美学路向。在抗战实践中不断发展壮大抗战文学,本质上正是民族精神和人民智慧的集中文艺呈现。这不只是对抗战争的单一记叙和表现,而是将文学与人民的生活、精神结合起来,并彰显了鲜明的时代气息。对通俗文学的形式运用,对民间旧形式的改造和利用,成为一时的热潮。基于现实的需要,他们采用了一系列便捷的文艺形式,出现了“街头剧”“街头诗”“朗诵诗”“小说朗诵”和“演讲文学”等文艺形式。对于民众关注的典型人物和事件,作家采用简洁、生动的笔法创作“速写”和“特写”等新型作品。通过报告文学作品,作家追随现实的激变,快速地反映到自己的作品里。抗战中流行的通俗刊物《抗到底》《大家看》《大众报》等,大都刊登着群众喜闻乐见的小调、快板、大鼓等作品。抗战的深入与文学的掘进,也突出地反映出人民文艺审美形式的大胆突破及其精神向度的深化。

总而言之,抗战文学是作家们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形势下开展的文学创造,它既是对生活的记录,也是生活本身,文学与生活真正是“合二为一”。作家笔下的每一个文字,都带着特殊的时代体温,彰显着那一个时代的人们的心声。在文体和形式上,作家们更强调它的生活性、实用性,并在现实实践中不断进行融合创新,积极探索文艺的民族形式和中国风格。在新时代,文学创作面临着新的形势、新的经验。新时代的作家应该像抗战时期的作家那样,深入现实生活的密林,发掘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书写那些默默奋斗的人们,以更加多样的文学形式展现新时代的新气象,创造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文艺精品。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向前进》刻画革命先辈坚定信仰

本报讯 8月18日,由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四川文艺出版社承办的“烽火记忆与光影铭刻——《向前进》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吴义勤,中国作协原副主席高洪波,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中国韬奋基金会理事长刘伯根,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编辑雷华出席并致辞。2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党总支书记、社长冯静主持。

《向前进》由作家刘海栖创作,为“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风雷顶》的姊妹篇,通过东北野战军老兵刘进璋的亲口述,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军民同心、浴血奋战的壮阔历史画卷,细腻刻画革命先辈坚定不移的信仰和钢铁般的意志。

与会专家认为,《向前进》不仅是对父辈记忆的珍贵记录,更是连接历史与当代、传递信念与力量的重要载体,有助于帮助读者全面了解革命战争历史全貌,引导青年一代深刻感悟红色精神的时代价值。随着文化自信不断增强,像《向前进》这样真实感人的红色口述文学作品,将成为激励青年一代继承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力量。

刘海栖在回顾创作历程时谈到,在整理父亲口述史料时,自己深刻体会到老一辈用信仰和行动书写的“长征路”。希望《向前进》成为青年读者了解历史、汲取精神力量的重要读本,激励更多人以坚定步伐走好新时代新征程。

# 专家研讨汤成难小说创作

本报讯 8月9日,由江苏省作协、上海文艺出版社主办的汤成难小说创作研讨会在江苏南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邱华栋视频讲话。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郑焱,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作家汤成难及1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活动。研讨会由江苏省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鲁敏主持。

邱华栋表示,汤成难是青年作家梯队里极具辨识度和创作活力的作家,她的作品语言简洁而富有张力,叙事兼具冷静与灼热,白描处如手术刀般精准,抒情中蕴含丰富的情感冲击力。她的作品中有对命运偶然的追问,对时间本质的探索和对爱与孤独的书写,体现出青年作家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以及在艺术表达上的积极探索。

大家谈到,“逃离”与“寻找”是汤成难小说中的重要母题,其作品兼具力量与深度,注重普通人心理与情感的深入表达,展现人物在命运中的自我感知。希望作者在今后的书写中进一步增强个体与时代的联系,为江苏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增添新的维度。

(王泓博)

## 八方文讯

### 《经典的炼成》聚焦鲁迅研究

8月2日,由首都图书馆、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的“鲁迅的世界与经典的启示——《经典的炼成》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该书作者阎晶明,作家梁晓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与会,深入探讨鲁迅及其作品的影响、鲁迅研究的意义以及如何阅读经典等话题。

《经典的炼成》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作者关于鲁迅及其作品研究的随笔10篇,上辑对鲁迅其人其作进行整体阐释和侧面解读,下辑对《孔乙己》《故乡》《祝福》《野草》等进行文本细读。

阎晶明谈到,所谓经典,就是“可以从一百个方向进入,进而打开一个广大的世界”。鲁迅对人民大众的生存境遇有深刻感受,他的笔触是接地气、有生活的,虽是多年前的经典,却永远让人感到亲近。梁晓声认为,研究推广鲁迅作品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鲁迅关注和探讨的许多问题在今天仍值得深思。韩敬群表示,《经典的炼成》体现出与读者平等交流的姿态。经典的阅读方法有很多种,最重要的就是在人生不同阶段不断重读,每次都会带来不同收获。

### 《洞庭人家》记录洞庭湖变迁史诗

近日,余红长篇小说《洞庭人家》研讨分享会在湖南岳阳举行。岳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启峰出席并讲话。3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入选作品《洞庭人家》以浩渺洞庭为宏大舞台,以宋家三代为叙事经纬,深情书写改革开放浪潮下的壮阔史诗,为新时代乡土文学注入历史纵深与人文温度。大家谈到,《洞庭人家》突出“洞庭”特色,着眼“人家”变迁,是对洞庭湖地区改革发展历程的一次全景扫描与深刻审视。这“人家”植根于洞庭湖的壮阔地理与丰饶馈赠,承载着湖区儿女的乡愁记忆与情感依托,熔铸着千年不绝的湘湖文脉与岳阳精神,是时代发展的微型舞台、生态觉醒的微观见证,也是乡情乡愁的具象承载。

### 《丁玲文学》改版首发

8月1日,由中国丁玲研究会和常德丁玲文学创作促进会主办的《丁玲文学》杂志改版首发式暨《永远的丁玲》画册分享会在京举行。活动以“在文字里寻光,在光影中重逢”为主题,1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丁玲文学的当代价值展开讨论。

据介绍,改版后的《丁玲文学》将秉持“名家引领与新锐培育并重”的编辑理念,既聚焦文学创作的先锋探索,亦深耕现实生活的厚重土壤。与会者认为,《丁玲文学》的改版既是探索传统文学期刊转型实践的新举措,也是对丁玲“人民性”文学理念的当代传承,是新时代文学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生动实践。画册《永远的丁玲》通过200余幅历史照片、手稿影印及题词真迹,全景式呈现丁玲从文学创作到革命实践的壮阔人生,其中所展现的跨越时空的文学精神与革命情怀,至今仍深深烙印在读者心中。

### 徐皓峰新作跨文本解读《红楼梦》

近日,导演、编剧徐皓峰新作《通灵宝玉与玫瑰花蕾:〈红楼梦〉中的导演演》在京首发。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赵薛参加首发式并致辞。媒体人窦文涛与作者徐皓峰展开对谈。

作为徐皓峰对《红楼梦》的一部跨文本再解读之作,该书以文学与电影的双重视角,将曹雪芹的创作放置于世界电影之列,从细节上捕捉《红楼梦》的原旨与人物性格逻辑,从影像语言的角度展现文学经典原著的多重魅力。书名中的“通灵宝玉”指代《红楼梦》,“玫瑰花蕾”指代现代电影。徐皓峰谈到,自己是用拉片的方式来研究《红楼梦》的,希望读者透过电影导演的视角,对比草蛇灰线、回风卷雪等多种叙事方式,体会曹雪芹在小说中匠心独运的编剧手法。与会者认为,从这本书中,读者可以将曹雪芹的文字想象成一幕幕意蕴丰富的电影镜头,并由此感受到文学与艺术的相通之处,不断发掘经典文本生生不息的传承活力。

## 通过书写社会现实传播真善美

8月5日,作家康海燕在京做客“作者面对面”活动,围绕其创作与读者展开分享交流。

康海燕的长篇小说《小康之路》取材于作者的成长经历,真实反映了国家级贫困县脱贫摘帽的历程,展现了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壮阔。《中医之道》是康海燕走访全国16个省市、采访数百位专家后完成的报告文学作品,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中医药文化的深厚底蕴。“家庭教育三部曲”则凝聚了她20多年为人母的实践经验与思考。康海燕谈到,文学创作源于生活、反映时代,作家要牢记使命担当,通过书写社会现实不断传播真善美。

(刘鹏波)

### 陈满平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民进》编辑部编委陈满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6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陈满平,笔名满平,民进会员。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晨光》《生命之树》《绿》《城市交响》《陈满平短诗选》等。

### 罗旋文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赣州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罗旋文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8月6日在江西赣州逝世,享年96岁。

罗旋文,笔名罗旋,中共党员。194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南国烽烟》《梅》《何仔·妹仔》《天凝山神女》《破戒》,小说集《红线记》《野马》《败将》《含笑》《还魂草》等。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江西省人民政府优秀文艺作品一等奖、江西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谷雨文学奖等。